

在儒家式的唯心哲學向度之下，梁啟超接受有機體的國家觀，從內在的積極自由界定個人自由。晚年在與柏格森等唯心哲學家相晤相契之後，頌讚中國的精神文明；對資本主義缺乏好感，嚮往基爾特社會主義，卻對激進的馬克斯主義及其唯物論，採取強烈反對的態度。要之，梁啟超思想的主要形貌，由上述的幾個支柱架構而成。此一思想架構，似乎只有透過一種唯心哲學的向度，才能夠提供深入而周延的解釋。

五、結語

做為中國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橋樑，梁啟超對於他所繼承的儒學以及引介的西方自由主義，儘管持論偶有變遷，不過深一層地探究，可以發現他的詮釋進路植基於一種唯心哲學之基底。此在儒學，即是從孟子以迄陸王的心學；在自由主義，則是積極自由與有機體的國家觀。論者每謂梁啟超的思想發展常有變化，即梁啟超自己亦歸咎自己「太無成見」有以致之。然而正如「萬變不離其宗」這句話所顯示的，梁啟超思想的變化，並未脫離其唯心哲學的基本論旨。如果我們沒有深究到此一基本論旨，即難以對梁啟超的思想得到通盤之理解。以李文蓀《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此一研究梁啟超的代表性著作為例，面對梁啟超澎湃的思想發展，只有以西潮衝激之下的心理反應做為解釋。⁴⁹此一解釋，頗受後起的研究梁啟超論著之批判。唯細釋諸多論著，似亦未能提供一通盤之解釋架構。本文透過對梁啟超有關儒學與自由主義詮釋進路的探究，揭示其思想基底的唯心哲學向度，對於梁啟超思想的理解，應可提供一個新的參考架構。

六九年）一書所寫序言，頁2-3。

⁴⁹ Levenson, *op. cit.*, pp.4-5.

改革與革命—— 以民國時期的改革派為中心的討論 (1911 - - 1949)

薛化元

政治大學歷史系

一、緣起

梁啟超作為清末民初重量級的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在政治立場雖然屢經波折，有多次的轉變，然而，大抵上無論是清末立憲的主張，或是民國以後擁護共和體制，追求立憲，漸進的改革似乎是梁啟超理想的「正途」。問題是：民國成立以後，相對於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梁啟超雖然較傾向於體制內的改革，不過他在護國軍之役與支持段祺瑞討伐張勳復辟，其政治作為又呈現明顯的革命色彩。¹換句話說，梁啟超做為中國現代史上採取改革路線的代表性人物，在現實政治路線的選擇，有時候仍然出現在

¹ 參見張朋園，〈自序〉，《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民國67年），頁1-2。本研究問題意識的提出，以及筆者個人對此問題的初步認識，皆受到張教授研究成果的啟發，不敢掠美，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改革與革命中搖擺的現象。然而，梁啟超並不是單打獨鬥、沒有派系的政壇「孤鳥」，相對的，他隱然是革命派之外另一個政治傳統或政治派系的代表人物，縱使他過世了，他的政治事業在後繼者努力下，依然不絕如縷，在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政治舞台，扮演一定的角色。因此，筆者擬以既有對梁啟超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考察其政治事業後繼者政治路線的選擇，並討論其在改革與革命之間遊走的歷史意義。而其政治事業的後繼者中，採取組織政黨的具體行動，追求制訂憲法的政治目標的，可以中國民主社會黨（及其前身中國國家社會黨）創黨黨魁，同時也是現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起草人的張君勱最具代表性。

張君勱與梁啟超在政治上結緣，並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可以溯及戊戌政變期間。本來在中日甲午戰後，中國知識界瀰漫在一片救亡圖存的風氣中，張君勱奉母命於光緒二十三（一八九七）年進入廣方言館就讀，次年適逢戊戌政變，在廣方言館門口懸掛通緝康梁的照片，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²這個印象對張君勱以後投身政治有多大的影響，當然可以再評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對他而言，這一印象並非孤立的偶發事件。因此，在離開廣方言館以後，就因為讀了梁啟超〈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原本在廣方言館讀書每月可領津貼一兩的張君勱，便設法籌湊一百多兩的學費，進入震旦學院就讀。³由前述的討論，可以得知：在留學日本以前，張君勱雖然未與梁啟超認識，在認知與行動上，卻已相當信服梁氏，因此，他日後追隨梁啟超，在此時實已可看出端倪。光緒三十二（一九〇六）年，張君勱以他積蓄的四百多（銀）元，和得到寶山縣公費留日的獎助，踏上旅日的行程。⁴

² 程文熙，〈君勱先生之言行〉，《再生》總 248 期（民國 38 年 1 月），頁 8。

³ 張君勱，〈我的學生時代〉，《再生》總 239 期（民國 37 年 11 月），頁 7~8。

⁴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收入《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台北，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印行，民國 65 年），頁 4~5；張君勱，〈我的學生時代〉，《再生》總 239 期，頁 8，則說係以積蓄留學，但事實上留學之初則應係公費的資助為主因，參見許紀霖，《無窮的困惑》（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頁 25。

到了日本求學，碰巧光緒三十三（一九〇七）年梁啟超組織政聞社，張君勱便加入其中，不久更成為正式追隨梁啟超的重要份子，一直到梁啟超過世為止。⁵同時，他也向《新民叢報》投稿，賺取因公費中斷所需起碼的生活費，直到其停刊為止。⁶而就在此時，張君勱在某些時候已經開始成為梁啟超的私人代表，代表梁啟超返國進行政黨、立憲活動。⁷在此階段，張氏與梁氏建立了深厚關係，成為他日後繼承梁啟超政治事業的重要原因。⁸以下擬以從清末民初以降張君勱的政治主張著手，考察其政治路線的選擇及其意義。

二、追隨梁啟超時期

張君勱曾說他自己的政治路線是「英國的」，⁹其所指涉的是他在法國大革命模式與英國漸進改革之間的抉擇，因為「英人種政治之天才，在善通舊制以適新需，故雖無赫赫之名，而善舉幸福之實」。¹⁰此一選擇與他生命本身的保守一面較能相契，也是他的政治導師梁啟超立憲主義立場下的選擇。而光緒三十二（一九〇六）年他研讀穆勒（J. S. Mill）的思想（主要是《論代議政治》〔*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不僅提供改革政制的條件，也提供反革命派的理論基礎。因為穆勒的思想透過張君勱的詮釋，表現了下列的概念：政體必須與「國

⁵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 67 年），頁 267~270；程文熙，〈張君勱先生與梁任公先生〉，《再生（台北版）》3:1（民國 62 年 1 月）。

⁶ 張君勱，〈我的學生時代〉，《再生》總 239 期，頁 8。

⁷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58 年），頁 185~187；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8。

⁸ 張朋園是國內研究者中，指出張君勱一輩繼承了梁啟超的意志，在梁啟超之後，這一派知識份子在民國使上將繼續扮演其所擔任的角色。張朋園，〈自序〉，《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70。

⁹ 參閱程文熙，〈張君勱先生的十大政治譯著〉，《傳記文學》28:3（民國 65 年 3 月），頁 11。

¹⁰ 張君勱，〈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原載《新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60 年），頁 1；江勇振，《張君勱思想評述》（台北，師大史研所碩士論文，民國 64 年），頁 21。

民之性情行誼」互相配合，而且只有人民的「行動力足以維持」的條件下，才得以「永續」。¹¹另一方面，他認為事實上滿族已被「同化」，已和漢族同在「苦樂榮辱」與共的歷史傳統之內，面對中國的危急存亡，應該共同戮力於改革專制腐敗政府的政治革命，而實現立憲政治的目的，相形之下進行種（民）族革命則是不必要的「復仇主義」。¹²當面對清廷立憲召開國會之舉遲遲沒有進展之時，光緒三十三（一九〇七）年，張君勱也從其所理解的自由主義中，找到行動的理論依據。他強調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立憲成功與落實，必須以國民的要求為原動力，因為「國民之能力增一度，則政府之壓制縮一度」。¹³

就此一思考理論而言，國民的思想和能力似乎成了達成立憲目的的最重要因素。¹⁴但是，就在國會是否應該立即召開，在中國國內立憲團體中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際，張君勱固然是正反俱陳，對二派主張都有所批評，但對國民的要求之重要性，則並未強調。在應然的層面，如上所述，只要國民的程度具備了一定的水準，以有「能力」國民的要求為原動力，促成立憲的成功與落實，最合乎張君勱的理想。不過，在實然的層面，他所面臨的卻是國民程度不足，又需要召開國會推動改革的兩難。張氏表示，要求速開國會的主張，並沒有注意在中國的落後與人民程度不足的情況下，召開國會的危險：首先，中國正求「力固國本，以禦外侮」，是否禁得起開國會以後「內閣更迭」頻頻；其次，一旦開國會，本來抱持「革命主義者」將轉而求「執議院政策」，不僅難免「政爭之局」，更造成「國事之危殆」；最後，國會初開的中國，以「散沙亂石，漫無紀律之數百代議士，以當政府」，必易陷於「買收運動」等「歷史上之惡習」的困境。不過，他也指出教育的改革與人民知識的提高，並不是召開國會的前提。¹⁵

¹¹ 張君勱，〈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原載《新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頁4。

¹² 參見江勇振，〈張君勱思想評述〉，頁23；張君勱，〈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原載《新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頁19。

¹³ 張君勱，〈論今後民黨之進行〉，原載《新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頁30。

¹⁴ 江勇振，〈張君勱思想評述〉，頁23。

¹⁵ 張君勱，〈論今後民黨之進行〉，原載《新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頁36～38。

張君勱以為，「立憲政治之行，不必定俟國民權利觀念之發達」，「國民思想之改良，非旦夕可期」，因此，國家政治「無論其改革前改革後」，皆必須由少數菁英「主持而提倡之」。因此，中國當務之急便是以「少數先覺之士」主導，從速奠定立憲政治，「以開發全國國民，圖永久之社會改良」。

¹⁶

根據前述的討論，在推動政治改革的過程中，張君勱雖然也曾斷斷續續強調國民教育水準的重要，不過依其前述的理路來看，縱使國民水準尚未提升，當有機會進行體制的改革或創建時，他則傾向把握時機。所以，此一思考模式，比起以國民知識水準作為改革的指標，更能表現出張君勱的實際行為取向。

換言之，在他思想中，文化層面的條件如果能配合制度層面的改革與創建，自然是最理想，當二者不能配合時，他固然強調必須在前者下工夫，比以求建構制度的有利文化條件，不過，若有機會尋求制度的建立或改革，張君勱亦會戮力以赴。¹⁷從「召開國會」的討論中，也可以看出張君勱希望能具足、強化、建立制度所須的文化條件，而在安定中進行政治建設的價值追求。

辛亥革命發生後，張君勱的實際政治行動也展現了前述的價值取向。他除了返鄉擔任寶山縣議會的議長，並和其弟張公權「發起籌備『神州大學』和成立『國民協（進）會』」，希望從教育與社會事業著手提升國民的能力與習慣。¹⁸但是，在歷史現實上，他則在政治運作上用了更多力，國民協進會也成為民主黨的前身。¹⁹更重要的是，在帝制即將傾覆，共和國

¹⁶ 張君勱，〈論今後民黨之進行〉，原載《新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頁37～38。

¹⁷ 許紀霖比較張君勱與黃炎培二人的主張後，便指出張氏救國的主張著重在「變革政制」，而黃氏則是啟發民智，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頁32。

¹⁸ 轉見江勇振，〈張君勱思想評述〉，頁29。但其註中所引的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民國61年），則未見此一資料。

¹⁹ 國民協進會合併改組成民主黨一事，見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台北，

已成為中國新國體之際，原本主張君主立憲的他，除了政治路線何去何從的抉擇外，還必須面臨如何選擇新的合作對象的問題。基本上，民國體制的建立，雖非梁啟超、張君勱諸人本來的願望，但是鑑於國家體制不堪一再反覆，因此轉而求其次，希望在民國政治體制下進行政治建設。然而，此一主張的轉變，並不只是消極的無奈，反過來說，張君勱基於在既有體制下改革的信念，已經成為民國共和體制的維護者。²⁰同時他於民國元（一九一二）年初，清帝尚未退位之際，首先致函梁啟超表示：孫中山、袁世凱的兩派勢力都不是能夠建設今後中國的力量，即使與他們聯合也沒有益處，故而應該超然獨立於此二黨之外，先不斤斤計較政權的得失，而另行揭櫫政綱以等待天下輿論的歸向；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上，民主憲政體制下的政黨是必須爭選舉、爭議席的，為了壯大、發展黨勢，因此必須選擇其一合作，而其中袁派較孫派適合「建設之業」，故主張「聯袁，以造成一大黨」。雖然，他曾表明：「聯合之目的，並非在爭政權，藉力以發展支部於各省，數年之後雖不欲不聽命於我，安可得焉」，²¹最後使袁必須依舊立憲派的意旨而施政。整體而言，前述政治路線選擇的重點則在於張君勱主張藉權力核心而推動政治建設的意圖。問題是選擇現實政治上的「實力在握者」，固然是推動體制改革改革的正面條件，但是，「實力在握者」是否真能與改革派合作，推動改革則是一大問題。²²

在改革派追求體制內改革的理念下，與變更國體的主張有嚴重矛盾，因此，當袁世凱以後欲變更國體回到君主立憲體制時，梁啟超、張君勱等人的反袁行動也與此一信念相關。不過，張君勱之所以在同儕之中最早展開反袁的行動，倒不是因為他看出袁氏有帝制自為的可能，而是因為袁氏的對外政策表現出默認蒙古脫離中華民國。²³張君勱與梁啟超一樣是大民

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1年），頁16～17。

²⁰ 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頁372～3；張君勱，〈全國各民主黨派大合作定止亂圖治之方針〉，《自由鐘（美國版）》1:12（1967年2月），頁4。

²¹ 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頁372～3。

²²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

²³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1979年），頁440。

族主義者，主張漢族與各族同化成一「國族」，²⁴他過去反對革命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革命雖成，滿蒙必失」。²⁵他本來主張聯袁的重要立論之一，就在於袁氏較革命黨穩健。但是，袁氏當政的結果，卻是使蒙古脫離中國的隱涵危機浮上檯面，因此，張君勱便在《少年中國》發表「袁世凱十大罪」，²⁶強烈批評袁世凱。

奈何袁世凱主政下之新民國，一仍滿清政府不尊重人民言論自由的舊慣，張君勱以言賈禍，便在梁啟超等人的鼓勵下，赴德國留學成為自我流亡海外的異議份子。²⁷至於梁啟超此對與袁世凱的合作並未斷念，縱使袁世凱解除國民黨議員資格，國會停開，梁啟超及進步黨被迫失去政治舞台，梁啟超仍未採取強力反袁的態度²⁸。直到袁世凱推動帝制，才採取實際的反對行動。而當中國國內蔡鍔等人發動護國軍，討伐袁世凱稱帝變更國體的行爲，梁啟超便電召張君勱返國參與討袁工作。²⁹雖然立場相近，但在對袁世凱的態度上，仍可以看出張君勱比起梁啟超，一旦既有體制內的結盟者未能落實結盟的本然目的，更富有起而對抗，以維持落實理想的初衷。而在討袁期間，梁啟超便與北洋派實力人物段祺瑞、馮國璋結合，而且支持馮國璋擔任副總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³⁰

張君勱在這次留歐期間，適逢歐戰爆發，他不僅未如留學生一般匆促返國，反而不斷觀察戰局變化，考察戰時各國的制度與國情。³¹經過用心

²⁴ 張君勱，〈穆勒約翰議院政治論〉，原載《新民叢報》，引自《開國前後言論集》，頁19。

²⁵ 張君勱，〈吾國政黨發展之回顧與吾黨之將來〉，《再生》總109期，轉見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頁41。

²⁶ 張君勱，〈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的經過〉，原載《宇宙旬刊》3:11，引自《中華民國獨立自主與亞洲前途》，頁208。

²⁷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11。

²⁸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33。

²⁹ 蔣勻田，〈張君勱先生一生大事記〉，《傳記文學》14:4（民國58年4月），頁83；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頁68。

³⁰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91、93。

³¹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11～13；江勇振，《張君勱思想評述》，頁37～40。

的觀察，張君勱認為戰爭最後「德國必歸失敗」。³²而此一信念在張氏返國以後，是他再一次介入政局核心的重要引子。

民國五（一九一六）年四月張君勱回到中國後，並沒有能夠趕往協助蔡鍔，而被呂公望留在浙江，參與浙江獨立的工作，³³並且不久就負責與梁啟超淵源甚深的《時事新報》筆政。³⁴在同年的五月到十二月，張君勱與梁啟超往來十分密切，期間對於國事的未來，亦應有相當的討論。結果，梁啟超與張君勱在十二月至北京時，已經公開主張對德宣戰。³⁵為了落實政治理想，他們在政治上的結盟對象，則是袁世凱死後，擔任總理的北洋派實力派人物段祺瑞。張君勱力主對德國宣戰，乃是認定德國必將失敗，希望藉此舉來挽回中國的利權，³⁶而此一主張主要透過梁啟超影響了段祺瑞，民國六（一九一七）年初段氏力主參戰以後則使雙方關係更為密切。

³⁷

但是，參戰與否在中國政壇上爭論不休，總統黎元洪反對，國會也不贊成，加上段祺瑞又欲強力威迫國會通過，最後遂演變成黎元洪召張勳入京，造成清帝復辟的結局。³⁸梁啟超及張君勱雖未必完全同意段祺瑞的作為，但是為了對抗復辟，他們甚至主動激勵段氏必須起兵討伐，張君勱更奔走南北，四處遊說。等到復辟失敗，梁啟超等人用力既多，也成為新的政治利益重新分配的得利者，³⁹張君勱也應馮國璋的邀請，擔任總統府的秘書。⁴⁰

³² 張君勱，〈我的學生時代〉，《再生》總 239 期，頁 8。

³³ 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三冊（台北，傳記文學，民國 68 年），頁 8；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13。

³⁴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89。

³⁵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139～140。

³⁶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14。

³⁷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革命》，頁 91、143。

³⁸ 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466～467。

³⁹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92；江勇振，《張君勱思想評述》，頁 44。

⁴⁰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14。許紀霖提及梁啟超本欲把中國商銀總裁由張君勱擔任，但張氏則推薦學財經原本在該行任職的張公權接任，《無窮的困惑》，

討伐復辟，使梁啟超等人與段祺瑞在政治上成為真正密切攜手政治伙伴。⁴¹而梁啟超、張君勱等人襄贊「再造共和」以後，認為根據過去的經驗，在國會運作與國民黨嚴重衝突，沒有合作建國的可能，而「再造共和」既給予其主導未來政治發展，落實理想的可能，遂支持段祺瑞排斥國民黨占多數的舊國會，而以舊國會已被解散為由，主張另立法統，成立臨時參議會，欲藉此使研究系主導國會。但是，研究系與段祺瑞及皖系的聯盟並未穩固，既有政治立場的歧見，且有現實利益的衝突，結果在徐樹錚聯合交通系的財力強力運作下，無法如願。而梁氏雖然續長財部，但是遭到百般掣肘，最後隨段內閣的垮台而去職。梁與張君勱參與實際政治，卻因遭到相當的打擊而退出政治舞台。⁴²

雖然，參加現實政治的結局並不愉快，但在這一段短短的政治行動中，可以隱約掌握到張君勱在現實上的行為取向。首先，張君勱追隨梁啟超，以段祺瑞作為這一段時期的主要合作對象，在某種程度上，正與民國初年選擇實力者袁世凱，有異曲同工之處。這種不放棄藉政治權力核心企圖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傾向，終其一生，可以清楚看到。其次，張君勱固然如前所述，基本上是改革派，希望在既有體制上進行改革，但是，只要國體不變，與此次梁啟超主導的政治選擇相類，以後也有可能採取另立法統建立制度以進行改革。

現實政治雖然失利，但是張君勱仍然相當積極於組織工作。民國七（一九一八）年一月，張君勱便去函梁啟超，主張必須以精神結合同志，組織以紀念蔡松坡為名的「松社」，社員「人數極少，僅以平日能相信者為限，合軍人政客於一堂」。⁴³這種團體縱使未具現實的政治性，至少也是潛在的政治團體。同時，張君勱雖然退出政治舞台，對國事依然關心。因而同

頁 70，但事實上張公權擔任的是副總裁。姚崧齡編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頁 12、34。

⁴¹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92。

⁴² 參照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94～100、119～120。

⁴³ 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頁 541～542。

年十月張君勳去日本考察後，回國便致書徐世昌總統，討論未來如何應付和會事宜。同時，又因梁啟超前已催促他同赴歐洲考察，他遂由北京南下上海，參加這個具有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顧問性質的考察團。⁴⁴

自加入政聞社以後，張君勳正式追隨梁啟超，以改革派的角色，進行思想與政治活動。在此一期間內，他雖然接觸到西方的法政學科，但無論在現實政治或政治思想方面，都尚未正式成為袖型人物。不過，此時他的思想已經展露出一些重要的特點，貫穿了以後不同時期的主張。除了改革的政治態度外，首先，是透過穆勒代議政治的詮釋，表現了其思想中嚴復式追求富強的自由主義面貌。其次，雖然自由主義下個人的角色十分重要，但在個人（國民）能力未能具足前，張君勳明白選擇了菁英主義，強調菁英主導的重要性與關鍵性，並表現了與強者（袁世凱、段祺瑞）結盟，藉著與權力核心的政治人物合作，希望能促成改革理想的實現。

三、張君勳自我主導的階段

誠如張朋園教授指出的，民國七年以後，梁啟超退出現實政治舞台，⁴⁵張君勳在政治路線選擇上的主體性也更加凸顯。民國九（一九二〇）年一月，張君勳在飽受巴黎和會的刺激後，陪梁啟超等人去見倭伊鏗（R. Eucken）。在與倭氏的談話過程中，他受到倭氏本人生命力展現的直接衝擊，加上由於倭氏答應梁啟超寫的新舊唯心論的比較，在梁啟超一行返回柏林時已經寄達，更使張君勳感動，並對倭氏的人生觀與哲學深感佩服，便決定留德從倭氏學哲學。⁴⁶此時，由於與實力派結盟推動政治改革的行動遭到頓挫，張君勳對現實政治舞台無從著力，因此張君勳在寫給林宰平

⁴⁴ 程文熙編錄《張君勳先生年譜初稿》，頁16；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52。

⁴⁵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4-5。

⁴⁶ 張君勳，〈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的經過〉，原載《宇宙旬刊》3：11，引自《中華民國獨立自主與亞洲前途》，頁211；張君勳，〈學術方法上之管見〉，《改造》4：5（民國11年1月），頁2。

（志鈞）的信中所述，曾決然地表示對作為他第二生命的政治斷念，而歸向「學問國」。⁴⁷但是，此種選擇與其說是毅然脫離現實政治舞台，不如說是當推行現實政治改革幾無入手之處，而選擇從文化層面著手，希望建構理想的文化條件，以利未來理想政治體制的建構。就此而言，倒與他留日之時，思考「開國會」問題的理路前後呼應。因為，就在見過倭氏而梁啟超尚未返國之際，張君勳便去函向國內同志表示「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攬同志而已。惟內地吾黨旗幟不鮮明，則招致新人才之舉，無由著手」，並希望設法送人到德國留學。⁴⁸而且轉到哲學也是要探求民族立國的最根本力量，努力從此入手，來進行救國。⁴⁹在此期間，他雖然放出重話「以政治活動改良政治，則中國必不救」，⁵⁰並對「現實之政譚」表示敬謝不敏，而欲與「加富洱（C. Cavour）、卑士麥（O. von Bismarck）、格蘭斯頓（W. Gladstone）」暫別，將與「康德（I. Kant）、黑格爾（F. Hegel）」等哲學家「為儔侶」，只有在同志「出生入死之舉，以急國家之難」，才會「赴湯蹈火、決不人後」。⁵¹不過，就從民國九年開始，他就十分熱心地觀察德國、俄國在戰後的發展，在《解放與改造》、《改造》發表一序列的通訊與文章，討論中國的未來走向和介紹德、俄等國的新制度及轉變。⁵²到了民國十（一九二一）年底更總結其在此次留歐期間對各種政治、社會制度的心得，寫下〈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⁵³第一次提出較全面性的國家基本藍圖雛形。

⁴⁷ 張君勳，〈致林宰平函〉，《改造》3：4（民國9年12月），頁101。

⁴⁸ 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頁571～572。

⁴⁹ 張君勳，〈我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的經過〉，原載《宇宙旬刊》3：11，引自《中華民國獨立自主與亞洲前途》，頁213、220。

⁵⁰ 張君勳，〈政治活動足以救中國耶〉，《改造》3：6（民國10年2月），頁1。

⁵¹ 張君勳，〈致林宰平函〉，《改造》3：4，頁102。

⁵² 這些文章至少包括〈德國革命論〉（《解放與改造》2：3-4、〈德意志國憲法全文〉（《解放與改造》2：8）、〈德國新共和憲法評〉、〈記法國總選舉及總統選舉〉（《解放與改造》2：9）、〈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14）、〈讀六星期之俄國〉（《改造》3：1-2）、〈德國工務會議法之成立及其施行情形〉（《改造》3：9-11）、〈德國工務會議法律譯文〉（《改造》3：10-11）、〈社會所有之意義及德國煤礦所有法草案〉（《改造》3：11）、〈歐戰後世界外交之大勢及中國之方針〉（《改造》4：1）。

⁵³ 文載《改造》4：3（民國10年11月）。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留歐期間，張君勱表現了許多富有「革命」衝動的主張。前述提及如果同志有「出生入死之舉，以急國家之難」，則他「赴湯蹈火，決不人後」⁵⁴的說法，對照當時中國並無國難，張君勱的說法乍見之下，不免令人有突兀之感。但如果和他寄給張東蓀的信函相對照，張君勱的革命意圖就清楚了。因為在提出前述言論之前，張君勱由於眼見中國南北政府議和的僵局，便在給張東蓀的信中直言，必須把希望寄託在「多數有覺悟、有紀律之青年與公民」來「推翻」現狀，為此，他固然主張張東蓀等同志應當「懸此為大目的」，而他自己也表明為此「願為執鞭者」。

⁵⁵

這並不是一時衝動之下所留下的孤證，因為縱使比較德、俄兩國的發展，選擇德國威瑪共和的改革途徑，反對列寧式的革命之時，張君勱也還明白指出，「凡屬革命，不論其所爭為思想、為政治、為民族、為社會，吾以為當一概歡迎之，輸入之」。⁵⁶他同時表示革命之舉「為可暫而不可常，可偶而不可久」，表現出他傳入革命思想、分析革命史的意圖，卻未必是支持以革命作為改造中國的「經常性」途徑。而在作為國家基本藍圖雛形的「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中，他等於總結這段旅歐期間對革命的看法。他清楚地承認：在人類數千年的進化過程中，以「一線光明，時時照耀」，維繫希望的，正是「思想界、行為界之少數革命豪傑」。⁵⁷這並非只是言辭中表示贊美而已，他在分析議會路線與革命路線以後，雖然強調「以平日之鼓吹言之，則不能少議會政略」，但是臨時的作用，「則不能少革命手段」。⁵⁸換句話說，他至少未反對革命的「奇兵」作用。

當然，從既有文獻來分析，可以發現這些主張乃集中在這段留歐期間，

⁵⁴ 張君勱，〈致林宰平函〉，《改造》3：4（民國9年12月），頁102。

⁵⁵ 張君勱，〈與張東蓀書〉，《解放與改造》1：6（民國8年11月），頁42。

⁵⁶ 張君勱、張東蓀，〈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2：7（民國9年7月），頁2。

⁵⁷ 張君勱，〈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4：3（民國10年12月），頁3。

⁵⁸ 張君勱，〈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4：3，頁12。

也正是他受倭伊鏗思想洗禮的時候。張君勱這種革命的傾向，或許與倭氏的「衝動說」，⁵⁹有某種程度的相關。

大體上，這次留歐使得張君勱除了過去對政治的關心之外，也開始重視哲學，可以說是他「不因哲學而忘政治，不因政治而忘哲學」的真正開始。⁶⁰另一方面，張君勱除了起草「國憲草案」以外，⁶¹對於中國憲政的發展，也寄以相當的關心。隨著聯省自治運動的失敗，他又把目光集中在中國當時力量較大的北京政府，希望北京政府先制定憲法再選舉總統⁶²。但是，在現實政治層面，為了解決當時中國南北政府對立的情形，於民國十二（一九二三）年直系逼宮之際，他也曾提出另造法統成立所謂「國民委員會」，以各方領袖張謇、蔡元培、汪精衛、吳佩孚、孫中山諸人為委員來解決時局。⁶³這種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希望在既有體制外另起爐灶，以化解政治僵局進行政治改革，在某種層面上，正是「再造法統」改革方式的再次提出。

張君勱的提議在現實上並未發生作用。在實際掌控北京政局的直系支持下，直系領袖曹錕公然賄選，當選大總統。對曹錕賄選的醜聞，張君勱雖嚴詞譴責，表示不承認曹錕領導下政府的合法性。⁶⁴但是，在國會通過「曹錕憲法」以後，使得民國成立以來的憲政體制建構工作，得到具體的成果，甚至使得依循憲法規定推動政治建設，成為可能時，就像他過去看待民國共和體制的成立一般，他對於受到本人主張影響很深的新憲法體制，便主張加以擁護，而要求政府遵行，而表現出他願意在體制內進行改革的基調。不過，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並沒有真正施行，甚至連曹錕本人也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垮台。中國政局進入新的階段，必須等到國民黨北

⁵⁹ 張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改造》4：5，頁2。

⁶⁰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24。

⁶¹ 參見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台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2年），頁135-137。

⁶² 張君勱，〈時局關鍵〉，《申報》，民國12年6月11日。

⁶³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20-21。

⁶⁴ 張君勱，〈我心理上國會之死刑宣告〉，《申報》，民國12年10月10日。

伐。⁶⁵

由於國民黨提出「一黨訓政」的主張，北伐的進展對張君勱個人而言，即是面對一個除非放棄原有的主張，否則幾無可能合作共同促進中國民主憲政發展的新局。而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由於「聯俄容共」政策使張君勱認為可能造成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得勢，而與其他舊研究系要角蔣百里、丁文江等人選擇協助孫傳芳，對抗國民黨。⁶⁶後來張君勱到武漢考察雖然稍微改變他對國民黨強烈的敵視態度，但是對於國民黨以黨建國及訓政的主張，則懷抱著國民革命可能以新的專制取代舊專政的疑懼。⁶⁷加上，國民革命軍接收他的學校，甚至連掛他自己的名字的書都不准出版，更使其對一黨專政下中國民主憲政的未來感到憂心。因此，在他與李璜合辦的《新路》雜誌中，有一半以上的文章，張君勱都集中焦點，直接向新的一黨專政體制挑戰。⁶⁸在「黨外」活動的張君勱遭到相當的打壓，甚至遭到「綁票」，遂再次赴德。⁶⁹

張君勱這次出國本來就不得已，因此在德國講學一年多後，主持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L. Stuart）邀請他至燕大時，他便離開耶那大學，取道蘇俄返回中國，其間並考察史達林五年計劃的成果，而於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夕返國。⁷⁰他返國以後，碰巧張東蓀也在燕京大學教學，二張遂聯絡梁秋水、羅隆基等人在同年十月成立「再生社」，作

⁶⁵ 張君勱，〈論憲法公佈〉，《申報》，民國 12 年 10 月 11 日。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頁 87。

⁶⁶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66；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頁 709。張朋園係根據藍晒本校正世界書局版，故原文應以張著為準。

⁶⁷ 張君勱，《武漢見聞》（上海，國立政治大學，民國 15 年），轉見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頁 99。

⁶⁸ 從《新路》雜誌刊登的文章來看，張君勱批判一黨專政體制的文章，就佔其文章的絕大多數。

⁶⁹ C.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Inc., 1952), pp.24-25;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⁷⁰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29。

為組黨的準備⁷¹。事實上，張君勱反對梁啟超晚年的「虛總部」⁷²後，組黨而努力始終沒有放棄。他出國期間，張東蓀、胡石青、湯住心、徐君勉、王搏沙本來就不斷洽商成立憲政黨，而他亦自德國來函要蔣勻田、馮今白等人赴北平從事組黨的事務工作。回國後，張君勱與同志會商後，認為憲政黨名義太舊，主張代以國家社會黨，而得到支持。⁷³由於「九一八」以後，國難當頭，已經成為黨魁的張君勱，並未依一般政黨原則，採取爭取政權的路線，反而強調應該組成「舉國一致」政府，以對付外來的威脅。對他或國社黨而言，此一主張也意味著加入既有政治體制，共赴國難的意向。

然而，「舉國一致」雖是張氏在此時最重要的政治理念，⁷⁴但是在一黨專政體制下，他的政治主張根本是「異端」，欠缺實踐的可能性。而他對一黨專政亦深表不滿，對於所謂訓政與孫中山直接民權的主張，也認為將阻礙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⁷⁵這固然是主張民主政治的在野黨必然的立場，但從其思想理路來看，若一黨專政壓制「異黨」的局面未能改善，他心目中聯合各黨派組合「舉國一致」政府的理念，也沒有實現之途。也因此，張君勱的國社黨雖然曾得到桂系和陳濟棠的同情，⁷⁶在南方積極發展黨務，並在香港辦《宇宙旬刊》，⁷⁷不過，國民政府平服陳濟棠以後，他及同志的經營乃大受打擊，學校被封。⁷⁸

⁷¹ 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頁 113。目前在台灣的老國社黨員也曾指出是先有「再生社」，再有國社黨，此意蓋指國社黨正式舉行大會是在再生社成立之後。

⁷²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 219；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頁 749。

⁷³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30。

⁷⁴ 從〈我們所要說的話〉，直到《立國之道》此為他設計國家基本藍圖的一貫理念。

⁷⁵ 如張君勱，〈國民黨黨政之新歧路〉，《再生（北平版）》1：2，（民國 21 年 6 月），即為文章題目最露骨的一篇。

⁷⁶ 以前研究者因為學海書院的關係，有注意到陳濟棠的支持者，如許紀霖，《無窮的困惑》，頁 115。

⁷⁷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 38。關於此段國社黨在中國南方的活動情形，則係筆者訪談當時《宇宙旬刊》主要負責人楊毓滋，得到的資訊。

⁷⁸ 張君勱，〈二十餘年來世界政潮激盪中我們的立場〉，《中國民主社會黨》，頁 92。

國社黨與陳濟棠等人往來，固然表現了張君勱意欲托庇於不服中央的地方既有勢力之下，以發展黨務的態度，而這與民國初年他主張藉袁世凱的既有勢力來發展黨勢，也頗為相類。不過，當時相對於國民黨中央，兩廣的抗日色彩則更明顯。⁷⁹這與張氏當時力主抗日的行動，不致有太大的矛盾。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日本侵略行動日益激烈，張君勱參加了對日抗戰前夕廬山談話會。⁸⁰而到民國二十七（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正式允許所謂抗日救國的結社自由，⁸¹才有其後互換函件的行動。而原有備受執政黨打壓的局面，直到張君勱與蔣介石、汪精衛交換「私人函件」，在某種意義上國民政府承認國社黨的存在後，才稍有好轉。⁸²而張君勱的《立國之道（國家社會主義）》的出版，更是明示另一種主張，在國民政府允許下發行，這也是一黨專政體制下容忍的表現。⁸³

雖然參加抗戰，張君勱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特別在有關於如何推動憲政，檢討既有體制方面更是如此。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屆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張君勱、左舜生、章伯鈞等人的提案，要求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⁸⁴而中國國民黨的五屆六中全會，亦決議在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召集國民大會，⁸⁵表示具有實質決定國家政策權力的執政黨接受國民參政會的決議。但是，不僅國民大會沒有如期召集，作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表的蔣介石，在第二屆參

⁷⁹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台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頁260～261。

⁸⁰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39。

⁸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693～694。

⁸² 程文熙編錄《張君勱先生年譜初稿》，頁39～43。一般人多指稱此為兩黨互換函件，但蔣、汪的回函則有意不用任何職稱，也未明白提及國社黨，因此實為私人信函的性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台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頁260～261。

⁸³ 張君勱，〈『立國之道』新版序〉，《立國之道》（台北，民社黨中央總部，民國58年），頁1。

⁸⁴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564；孟廣涵主編，《國民參政會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5年），頁584～588。

⁸⁵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564。

政會第一次大會的演講中，反而重申「一黨訓政」，取消原本的決議。⁸⁶這對希望在國民參政會追求民主憲政的張君勱等人，⁸⁷自然是一大刺激。加上同年（民國三十年）一月發生新四軍事件，⁸⁸以及稍早第二屆參政員名單中將章伯鈞等人除名，使國共以外所謂民主黨派成員為了調停國共兩黨，並繼續結合以追求民主，便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⁸⁹其後，並在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九月，發展成為中國民主同盟。⁹⁰其間以這些在野人士為主體的中間力量，一直主張國共必須趕快用政治協商來解決糾紛。⁹¹而這種政治路線，基本上即上尋求在國民政府訓政體制之外，以政治的方法，另求建立新體制。

抗戰末期，張君勱對抗戰即將結束抱持非常的信心，因此對於戰後國共問題能否順利解決非常關切。⁹²但是，在他內心，對此能否藉由中國內部的政治勢力來協調解決，基本上抱持非常悲觀的看法。因此，雖然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本來就有調和雙方的用意，⁹³張君勱於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年底赴美以後，作為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的黨魁，仍然認為非由美國介入不能解決，而在與美國官員交換意見時，主張美方派遣代表（類似以後馬歇爾的地位）至中國，積極化解國共的爭執。⁹⁴而在戰後四年中，張君勱也始終想要調停雙方，促成中國的和平建國。民主同盟等第

⁸⁶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569。

⁸⁷ C.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Inc., 1952), pp. 112-114.

⁸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704。

⁸⁹ 平野正，《中國民主同盟 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3年），頁29～31，對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的原因，亦有相當的說明；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569～572；張君勱對於同盟成立時間的回憶，則與統一建國同志會混淆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1；C. Chang, op. cit., p. 114.

⁹⁰ 平野正，《中國民主同盟 研究》，頁62～65，其中並討論了二者性質的轉變。

⁹¹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585。

⁹² 張君勱在民國34年1月，便針對此在《民憲》1：11發表了〈國共問題公開報告以後〉。

⁹³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9年），頁571～572；C. Chang, op. cit., p. 113。

三方面從抗戰結束，歷經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其後調停國共，從事的也是此一方向的努力。⁹⁵儘管最後和談破裂，國共終究以兵戎相見解決爭端。張君勱率領其追隨者在其間，如同民國初年基於現實考量選擇了袁世凱一般，雖然此刻抉擇更為兩難，他終究捨棄了革命的共產黨，脫離民主同盟的陣營，戮力於中華民國的制憲大業。

由於欲結束訓政進入憲政，並調和國共兩黨，而在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本身就是既有體制之外，尋求政治解決的可能。張君勱在協商過程中，反對原本根據國民黨一黨訓政體制產生之不具民意的國民大會代表，及其擁有自由意志制憲的權力，反而要求承認政治協商會議結果對制憲國民大會制憲的內容，應有實質約束力。⁹⁶雖然這些主張在民主理論上都有一定程度正當性的基礎，但是，這並非循正常政治體系運作來推動改革，也是事實。

但是，參加共產黨及民盟抵制的制憲固然重要，對他而言，如有可能亦不願放棄和平建國。特別是在制憲之後，政府動員戡亂並不順利，和平建國的希望固然破滅，甚至連以武力壓制共產黨，建立依憲法推動民主憲政在現實上都面臨失敗的可能。如何在既有體制外尋求「和平建國」的可能，成為張君勱意向之所在。因此，在國共內戰擴大以後，張君勱便是原本支持國民黨執政的朝野人士中，率先去函蔣介石總統，表示為了和平的可能，希望蔣氏能夠辭職下野。⁹⁷而他所領導的民社黨（由國社黨與伍憲子領導的海外憲政黨合併而成），也曾公開表示，為了能夠有和平解決爭議的可能，願意重新檢討已經頒佈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⁹⁸這種態度基本上是在不變更國體的方式下，可以以新造法統的方式，來進行改革建

⁹⁴ 《張君勱手稿日記》，1945年11月21日。

⁹⁵ 也是因為調停不成，才造成第三方面的分裂，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年），頁150；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冊，頁621。

⁹⁶ 薛化元，《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頁187。

⁹⁷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153；雷震1949年1月21日日記，傅正主編，《第一個十年》冊一（台北，桂冠公司，1989年），頁125。

⁹⁸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161。

國。而且此一行為取向並不突兀，無論是在支持段祺瑞解散舊國會，另開新國會的梁啟超、張君勱，或是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張君勱，都曾抱持相類的立場。

總之，抗戰後張君勱追求中國民主憲政體制的建立與落實，希望在此一前提下和平建國，因此，從政治協商開始，他努力調和各方意見，擬就了「政協憲草」。奈何國共談判的破裂，既使其制憲與和平建國出現兩難。如同民國成立時選擇袁世凱一般，民國三十五（一九四六）年底他選擇較具實力且溫和的國民黨，參加制憲。但是，誰知剛依憲法成立政府不久，中共的武力就日漸壯大，他在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底便去函蔣介石總統，建議蔣氏下野，也願意不堅持既有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再造和平解決中國內戰的可能。

問題是：掌握優勢的中共根本無意和談，所謂的和談對其而言，就是如何和平接管。⁹⁹而張君勱本人更與蔣介石同列中共提出的戰犯名單之林。¹⁰⁰這種現實迫使原本即抱持反共態度的張君勱，¹⁰¹在中國大陸易手之後，雖對國民黨當局未能落實憲法有所不滿，但是大體上仍是有條件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反共，¹⁰²一再為文反對各國承認中共政權，¹⁰³反對兩個中國，¹⁰⁴反對美國傾向一中一台的外交政策。¹⁰⁵

⁹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786~787。

¹⁰⁰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記》冊四（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74年），頁818。

¹⁰¹ C.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p.310.

¹⁰² 薛化元，〈戰後中華民國政治史——第三勢力論——中華民國憲法起草者=張君勱主張中心〉，《大阪國際大學國際研究論叢》第10卷第3・4合併號，1997年，頁131~144。

¹⁰³ 張君勱早在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就反對各國正式承認中共，此一立場也始終未變。E. O. Reischauer，〈中國混亂局勢的客觀分析〉，《再生》總339期（民國42年6月），頁66。

¹⁰⁴ 對張君勱而言，兩個中國主張實現後，無論中華民國國號是否不變，在實質上便是「台灣共和國」。張君勱，〈論兩個中國政策〉，《民主中國》復刊3:2（民國49年1月），頁3。

¹⁰⁵ 這樣的言論在民國48（1959）年美國官方露出一中一台的外交政策走向後，一再地出現。參見對張君勱而言，兩個中國主張實現後，無論中華民國國號是否不變，在實

四、結語

根據前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民國成立以後，無論梁啟超或是其政治事業的繼承人張君勱是以相對於革命派的改革派著稱。但是，與除了辛亥革命之際，由君主立憲主張轉而支持共和立憲，歷經體制鼎革，仍然在體制內改革的政治路線，並在國體不變，政體可變的立場下討伐帝制自為的袁世凱外，與一般認知的體制內改革的主張並不相類。循體制外途徑改革體制，或是建構新的體制之政治路線，亦是他們「曾經」的政治選擇，其中再造法統式的改革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僵局無法突破時，也常常會表現出來。當支持段祺瑞擊敗復辟，「再造共和」，不肯恢復「舊國會」，而另立法統，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後，眼見北方各路人馬分頭角逐總統職位，卻無力真正化解中國軍閥割據與南北分立的局面，張君勱主張成立由各路代表人物組成的委員會，取代中華民國總統的職權，皆是如此，抗戰之後，主張並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亦是在既有體制之外，尋求政治解決的可能。縱使三黨合作通過了憲法，由於中共與民主同盟的抵制，加上中共在武力上逐漸取得上風，又堅決不肯承認既有憲法的正當性，使得政治上的解決越趨困難。張君勱基於政治的考量，先是去函蔣介石總統，要求其下野以利和談，繼之其領導的民社黨則表示願意將中華民國憲法列入和談的內容。這些固然也是迫於政治現實，但也是基於現實的考量，尋求以體制外的方式建立新的政治體制。

前述抗戰後張君勱的表現基本上已經和與革命相對立的改革派概念，有了一定的差距。不過，兩次之間也有不同，前者乃是為了便利改革，在國體不變的狀況下，以「憲法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憲政體制。後者則

質上便是「台灣共和國」。張君勱，〈論兩個中國政策〉，《民主中國》復刊 3:2（民國 49 年 1 月），頁 3。

¹⁰⁵ 這薛化元主編，《一九四九年以後張君勱言論集》冊一，頁 137～172。

是因為既有體制面臨中國國內敵對力量的強大挑戰，為了尋求和平解決的契機，在現實環境的限制下所做的政治抉擇，張君勱個人的主觀意願並不明顯。

除此之外，歐戰後赴歐的張君勱，在民國八年至民國十年之間，陸續發表主張，直接「肯定」革命，則更是在改革基調上顯得突兀。不過，這正是他在既有體制內無從入手的時期，也剛經歷與體制內有力者合作後遭排斥的挫折。為了尋求政治改革的空間，或真正取得參與現實政治的可能，非常的手段因而也必須納入考量。因此，張君勱才會表示革命之舉「為可暫而不可常，可偶而不可久」。並指出「以平日之鼓吹言之，則不能少議會政略」，但是臨時的作用，「則不能少革命手段」。

但是，前面討論的結果，並不足以完全推翻張君勱作為改革派的面貌，相對地只是說明改革派思想底層的革命傾向。因為以張君勱為例，留日期間追隨梁啟超，以及受了穆勒政治思想的影響，他在英國式的改革及法國式的革命之間，選擇了改革的路線。他所追求的，乃是在既有體制（國體不變）下進行改革的工作。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藉著介紹拉斯基（H.Laski）的理論，他一方面指出國家最終的決定權，是操之在一個個人之手，因此終極必須承認國民有革命的權利。但是，在實際的改造計劃中，則認為應持改良的方針，視革命家的意見為改造的障礙。這種改良的方針，也就是英、美國民性中的「零星改良」、「淑世主義」。¹⁰⁶

對張君勱而言，漸進式改革仍有其整體目標，而非僅以零星式的改良為足。他在民國十年，便在漸進改革之外，標舉出「澈底」的重要。¹⁰⁷民國三十六年，透過討論民社黨的路線，他對二者作了清楚的整合：因為民社黨是一個有主義的政黨，須追求主義的實現，所以雖然要走和平政黨，

¹⁰⁶ 張君勱，〈英國現代政治學者賴司幾氏學說〉，《新路》1:7（民國 17 年 5 月），頁 60～61。

¹⁰⁷ 張君勱，〈懸擬之社會改造同志會意見書〉，《改造》4:3，頁 12。

採漸進改革的路線，但目標仍在於「進化式的革命」(Evolutionary Revolution)。¹⁰⁸當然，進化式的革命雖然也有「革命」，卻與中國一般所謂的革命不同，強調其有終極的目標。因此，張君勱也曾一再強調：革命的心理與建國的心理是不同的，前者是破壞，是靠「奮不顧身的精神」，是靠武力與戰爭；後者則是「有思想、有經驗的建設」，是靠「冷靜的頭腦」，是靠和平與法治。¹⁰⁹

然而，他也清楚意識到，反對革命的建國路線，必須有政權公開、遵守憲法、保障人民自由等先決條件。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他的政治行動也都在企圖藉著民主黨派合作來進行建國大業。因此，主張「與其自居於革命派而陷於欲速不達，而起內部之爭。反不如議會政治派循序漸進之為得計」。¹¹⁰在革命與改革兩分的狀況下，他仍然選擇了改革。他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是：建國路線的先決條件完全不是他所能決定的，而由於先決條件不具備，沒有政治舞台，只能選擇自我放逐。而自外於既有體制，他的改革理念更全然失去著力點，所有的訴求與行為，雖是改革的理念在引導，但卻全在體制之外。

換句話說，由於未取得既有體制當權者的支持，張君勱的改革根本上是一種體制外的改革，與一般所謂循既有體制進行的改革路線不同。不過他改革的目的雖是企圖在既有體制之外，建立落實民主憲政的新體制，然而，「民國」的體制本來就應該是民主憲政體制，在此觀點下，他所訴求的也不過是改革而已。

¹⁰⁸ 張君勱，〈民主社會黨的任務〉，《再生》總160期（民國36年4月），頁5。

¹⁰⁹ 張君勱，《憲法十講》（台北，宇宙雜誌社，民國73年），頁1~2。

¹¹⁰ 張君勱，〈全國各民主黨派大合作定止亂圖治之方針〉，《自由鐘（美國版）》2：12（1967年2月），頁7。

與會學者名錄

- | | |
|-----|------------------|
| 丁 敏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 井敏珠 |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
| 尤石川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教 |
| 方炫琛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 毛知礪 |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 王文顏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 王世成 |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助教 |
| 王石番 |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兼傳播學院院長 |
| 王志楣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 王冠生 | 政治大學哲學系助教 |
| 王素芸 |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講師 |
| 王壽南 |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
| 王綱領 |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
| 王鍾和 |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
| 朱自力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 朱敬先 |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
| 朱靜華 |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 江金太 |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
| 何信全 |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 何思因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
| 余民寧 |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
| 吳文星 |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
| 吳圳義 |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
| 吳思華 | 政治大學企管系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
| 吳傳瑄 |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助教 |
| 呂 凱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 呂紹理 |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 李 增 |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
| 李孝悌 |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